



最近,上海“史上最严”交规开始实施。这些交规有不少是新创设,引起热议。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商业繁荣,交通发达,如何治理城市交通,是广大市民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发展和管理中必须解决的课题。

社会生活要有序进行,必须建立相应的行为规范。从上海最严交规的实施,不禁联想到规则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都市生活发生了巨变。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楼下小区里已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这在十几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令人困

扰的是,半夜里一些小区业主为停车问题发生争执,使左邻右舍在美梦中被吵醒。走上大街,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举目皆是。它在提倡绿色出行,推动解决交通“最后一公里”中功不可没,但它的“野蛮生长”,却有为人诟病的管理问题。

社会发展中,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规则,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这些新规则有的已经形成并出台,有的正在路上。在规则实施过程中,必须增强规则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如何敬畏规则、遵守规

则?这需要补课,补法律的课、各种规范的课。比如,我们从小就受到教育“老虎会吃人”。但现实中仍有游客违反相关规则,擅自进入野生动物区,以致发生老虎伤人事件。血的代价,说明人生不守规则,时时都可能补课。漠视规则,带来了灾祸的隐患,而遵守规则,则是个人的福音、社会的福音。上海去年3月启动交通大整治以来,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有所增强,上海的交通事故也有了明显的下降。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

降23.8%、14.7%、38.0%。

遵守规则要从养成良好的习惯开始。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讲规则的海派文化,这是上海城市文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时代的发展,又要求在培养遵守规则的城市文明建设中,在方法和路径上要有创新。上海市民中,大多数人有很好的公共生活习惯,但也有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乏遵守规则的自觉性,总做些缺乏公德但又违法的事。几年前,上海有关方面将地铁逃票者上传至征信

系统黑名单。这种诚信记录对于教育市民遵守规则、做诚实守信人起了很好的作用。它告诉当事人,你违反了社会公共生活的规则,必须引起重视,累积后会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在法律的威慑力下,当事人思想上会有所触动,行为上有所收敛,成效就显现出来了。这种记录和跟踪的过程,就其本身来说,是对事实的确认,但也内含着提醒和警示,也是一种教育。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要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用事实来“说话”,探索城市文明建设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当然,讲规则是全社会的事。不仅是市民的事,也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最近,全国有20个县级和县级以上政府因为进入失信名单而被曝光。政务诚信必须加强建设,为整个社会讲规则、讲诚信做出表率。企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被亮“黄牌”的不少,甚至亮红牌的也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充分重视企业自律的精神,要让企业尽可能地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这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城市文明呼唤规则意识

周中之

从雄安新区规划想起

魏英杰



这些天来,一个全新的地名——“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八个字,清楚地描绘了新区的分量及其意义。而从“起步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到“远期控制区面积2000平方公里”,则相当于为新区规划“画了一个圈”。

当然,具体规划的编制比这要复杂许多。但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期待着新区建设赶上互联网时代的效率与速度。短短几天内,炒房团、投资客已经在新区所辖三县闹腾了个遍,在当地全面冻结房产交易的背景下,当地房价竟然凭空从单价几千元蹿升至两三万元。

这是对新区规划建设的一种严重误读,也是对城市建设的一种偏颇认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城市的形成都是渐进的、逐渐嬗变的。哪怕这座城市一开始就像一张白纸,也可以按规划进行建设,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除了中国眼下仍在进行的城市化扩张,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雄安新区这样的优势条件,可以“把每寸土地规划清楚”才开始动工建设。只要稍微了解人类城市的历史与沿革,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三联书店“新知文库”里有一本《城市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城市从“最早的出现”,一直到今天的演变。

作为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城市“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按照书里所说,今天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到2030年,生活于城市的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而如果考虑到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相信这个时间表还可能

提前。作者引用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们”,来描述城市在人类事务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除了对城市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在哪儿开始”等问题进行历史考古,本书作者约翰·历史还谈到了城市建设不同模式及其利弊,而这就涉及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并不是现代产物。当然,现代城市的规模及其建设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古代城市,所以更加需要科学地规划。

科学规划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少一些行政主导,多一些专业判断。例如本书提到的大约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市米利都被波斯军队攻陷、毁坏后的重建,就体现了超前规划的思维。这座城市由希腊建筑师希波达姆斯负责总体规划,其规划并不是管五年、十年,而是当它“成长为一个五百年后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的八万人至十万人的城市时,它规划仍然是适应的”。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杰作。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纽约于19世纪50年代末如何在城市沙漠中建设出中央公园,伯明翰于19世纪70年代又是如何开始推行公共房屋计划,以及斯德哥尔摩于1952年公布的总体规划中,努力地想做到“任何一个公寓区距离一个地铁站不超过500米”……这些历史经验,为现代城市规划提供了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城市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雄安新区的“新”,就是要围绕中央提出的七个方面重点任务,广泛听取专家意见,秉持科学精神与专业原则,一丝不苟地做好各项规划工作。千年大计,始于足下;国家大事,细节决定成败。

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任大刚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是《增广贤文》里的名句。这句话屡次被主流舆论批评。

2016年8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常摸头上长“角”没》,其中提到,有人把“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庸俗哲学搬到工作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沉默是金、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得罪。

2016年11月30日,湖南日报刊发评论《且慢“难得糊涂”》,其中提到,我们一些同志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面对社会纠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者有之;面对是非争论,左右逢源、模棱两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有之……

陈云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全体干部会议时讲话,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在前几篇“贤文解毒”中,我已经反复讲过《增广贤文》是一本价值观极其混乱的书,前面它在讲“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也就是说对人要推心置腹,刚一转身,就告诫人,要处处提防他人的祸害。这种赤裸裸地教人人心口不一的东西,竟然被人捧为“国学经典”,让小孩子摇头晃脑高声吟哦,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句话,比较早地使用于其他地方,是在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篇中,李甲受到孙富的挑唆,打算收受一千两银子,把杜十娘让给他,谈妥交易,小说中写道:二人饮了一回酒,风停雪

止,天色已晚。孙富教家僮算还了酒钱,与公子(李甲)携手下船。正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这篇小说描写的具体语境中,李甲本人在性格上,最大的问题是软弱,在他与杜十娘的爱情中,一直不是一个主动者,瞻前顾后,既扛不住来自家庭的责难,也扛不住世俗眼光的审视。也就是说,一有机会,他就会逃避杜十娘的爱情。

而孙富的出现,恰好是苍蝇叮上有缝的蛋,他瞬间就被瓦解了。实际上完全可以设想,只要杜十娘没有“露富”,李甲随时会抛弃杜十娘,这个人可能是孙富,也可能是赵富、钱富。

既然如此,像李甲这种满肚子心事的人,即便向孙富吐露三分心思,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向赵富钱富表白内心的十分不爽,因此问题不在向谁讲了十分话,问题在于他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害得他最后失去杜十娘和巨额财富,自己痴疯发狂的,不是嘴巴不严,向人吐露心思,而是其严重的人格缺陷。换言之,这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此外,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确存在因言获罪,祸从口出,因此,逢人且说三分话,也就成为一种自保手段,处世经验。在政治风浪中,缄口不言的人,得以自保。

但须知,这绝不是值得写入“经典”的名言名句,而是现实生活的耻辱写照,是需要齐心协力尽力予以改正的。所以主流舆论一直对它口诛笔伐。

要言之,只有在一个病态的人格之下,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逢人且说三分话”才有它半遮半掩的合理性,它绝对不值得提倡。



这个周末,上海展览中心又开教博会,展示过去一年上海的教育发展成果,各种教育机构摆摊头,各路能与教育搭界的名师名家开讲座,患了强迫症焦虑症的家长们没准儿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益全家健康的信息,权作强心针或镇静剂。

不过每年教博会上,真正很能撑得起台面、让展会变得对孩子来说不再空泛、而是有趣和可爱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中职和技术学校的学生表演和职业体验活动。尤其是后者,能让平时更多埋头看书刷题的孩子们轻松快乐又动手动脑,了解各种职业技能,也了解自己的兴趣与特长。

也许就因为这类职业体验活动受欢迎,从三年前开始,上海由此发展出了固定在4月中下旬两个周末的“学生职业体验日”。全市的中职、高职和技校都选出自家最独特、自己痴疯发狂的,不是嘴巴不严,向人吐露心思,而是其严重的人格缺陷。换言之,这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然而,体验活动与展览的“兴旺”并不能掩盖职业教育不受待见、生产一线优秀技能人才缺失的社会现实。大国工匠只有在电视屏幕里出现时,才会引来敬仰点赞。

有见识的家长乐于带着年幼的孩子偶尔玩一把职业体验,却未必支持他真去选择读中职技校,除非是孩子实在“没出息”“没办法”。从幼儿园到小学,有多少家长在边抱怨边积极努力地帮助乃至包办,替自家孩子完成学校的手工作业,原因一是功课多,二是孩子动手能力差、做不来。像爱因斯坦那样笨到做了好几只不合格小板凳

“上海制造”还可能吗

姜泓冰

还在坚持自己做的孩子,恐怕不待老师同学嘲笑,早就被自家的老爸老妈心疼地骂回课桌边去乖乖做奥数或上床睡觉了,剩下父母大人在吭哧吭哧地应付最无足轻重的手工作业。

不少消费者都在忙“海淘”或“人肉背货”,很多人痛说我们因何造不出质量过硬细节完善的日用品。其中欠缺的,不仅仅是所谓高科技、拔尖科研和设计人才,更在于缺少一大批身负绝技的生产一线操作者。这样的时代,我们难免怀旧,想到三四十年以前的“上海制造”,举凡精密仪器仪表、各色轻工日用产品,其精细、完备、不断革新进步的能力,几乎都让人赞叹,依赖的不只是高工、设计大师,还有一批同样声名赫赫全国皆知、手艺高明、做事一丝不苟的“上海师傅”。

心灵手巧,向来是江南人的一大重要特征。“心灵”依旧,“手巧”已未必。看看身边的孩子,从小到大大很少有动手乐趣,连自己剥虾壳、敲鸡蛋的机会都不多,一做手工就信心全无,这样的例子太多。能做最精细的外科手术,能将一根细丝线破成几份来刺绣出最美妙的图画,能依据经验、直觉、手感将零部件整合到严丝合缝……这些上海人的传统优势,到了80、90、00以后的新世代,是否都会尽数失去?

上海已经代表中国申办2021年世界技能大赛。这几天,世界技能组织专家代表团正在上海参观考察。办一届漂漂亮亮的比赛,创几个吉尼斯纪录,出几个金奖匠人,对于有13亿人口的中国或是有2400多万人口的海,都不会是难事。难的是,我们是否能振兴自己的高端制造业,拿出我们自己的“苹果”、“宝马”、“香奈儿”,再让中国和世界传扬一回“上海师傅”?这可不是一件小事。